

傅明善 著



宋代 唐诗学

研究出版社

宋代唐诗学

傅明善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唐诗学/傅明善著

——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12

ISBN 7-80168-042-1

I. 宋…

II. 傅…

III. 唐诗—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D、I. 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519 号

责任编辑 阎 甫

宋代唐诗学

傅明善 著

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电话:010—63097512)

金华市科教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字数: 29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TSBN 7-80168-042-1/I·002 定价: 28.00 元

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傅璇琮

傅明善同志在宁波大学中文系执教,前些年,又去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萧瑞峰先生的指导下,写作学位论文《宋代唐诗学》。因为我与萧瑞峰先生有学术交往,我又是宁波人,近些年宁波出版社委托我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因此常去家乡,故与明善同志相识,他乃就这一选题常与我交换意见,我有时也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今年五、六月间,举行论文答辩,我未能去,后有机会见到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陈允吉先生评阅意见,他们都对论文评价很高,认为是用功甚深并创获颇多的优秀博士论文。作为同是浙江籍的同行学人,我是很感欣慰的。经过半年的细心修改,又经北京的研究出版社审阅认可,此书即将出版,明善同志嘱我写一序言。我现在写东西,确有力不从心之感,甚为费力,友人要我作序,我真有如中小学生课堂作文的负担。我为友人作序,也总有一个习惯,一定要通阅全书,有时还不只看一遍,一边看一边提出问题,请著者核阅或修改。明善同志的这部书,我就上半年看一次,最近又看一次。对这部三十万字的专著,我就不想在序言中作全面介绍或评论,因为序言与书评总是两种文体,序言可以自由一些。南北宋之际的许顗在其所著《彦周诗话》中,曾给诗话的体制下一定位,谓:“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意谓北宋时兴起的诗话,其论诗的范围是很广的,这可以使人读来轻松惬意。我想序

言也是如此，宋代如欧阳修、苏轼为人作序，也有同样意味。现拟仿许顗的语气，云：“序文者，辨学术，论世情，记交谊，抒己见，重理趣也。”

1983年，我曾为《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写一小文，其中提到：“唐代文学研究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条件创立唐代文学研究史。一门学科之可以建立学术史，是成熟的标志，而它的建立又可以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唐代文学的研究是一门科学，我们应当对它的历史加以探讨，作出总结。”（《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年）那时我虽然提出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研究唐代文学，但仅是一个设想，并不想得周全、明确。陈伯海先生于1988年出版其所著《唐诗学引论》，则首次把唐诗学作为学科建设提出，并把唐诗学的建设史分为五个时期：唐五代为酝酿期，宋金元为形成期，明代为发展期，清及民国初为总结期，“五四”以后为创新期。在这以后，我们海峡两岸，即大陆与台湾，就有不少唐诗学方面的专著与论文面世（详见陈友冰先生近著《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唐诗学作为学科提出，确从理论建构与具体操作上深化唐诗的研究，我们推进新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对此确应重视，并作进一步探索。

已有的唐诗学论著，其探讨的范围是相当广的，有体系建构与批评方法的研索，有风格、声律、意境、情志等范畴的设计，也有时期延续性与断代性的构筑，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以一个朝代为中心，以专书的体式，来全面论述某一时期唐诗研究的演绎过程。明善同志选择这一课题，我不敢说有突破性，但应该说是极有识见的。

我可能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总偏向于专题研究。就传统文化来说，宏观的把握，规律性的探索，固然重要，但基础还是个体性的研究。唐诗学，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们如果不从一个个具体的课题进行研究，很可能热闹了一阵之后，回过头来还

是停留在原来的起点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就不要再作大而全的概述性工作，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几个点，作精细而又有高度概括的探讨。而在唐诗学史上，宋代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点。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高峰，宋诗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一个时期的高峰，是不能离开大家的，正因为唐代有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大家，才形成这三百年间的文化强项、优势，而可以注意的是，宋代也出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家，因而形成那一时期的文化强项、优势。欧阳修等人的出现，是离不开对唐诗的传承的，而唐诗之能为后世所接受和张扬，也离不开宋代这些大家在创作和理论上的琢磨和研索。宋代唐诗学之所以在唐代之后形成一个特殊起点，是与宋代这一超级文化时代密切相关的。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应邀参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全宋诗》主编工作，深感宋人对唐代诗文整理之工力，后来我在起草该书的“编纂说明”中曾强调：宋人的这些努力，促进了唐诗的传播，开阔了人们对唐诗的认识，也提高了宋代诗人本身的文学素养，宋诗之所以继唐诗之后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与宋代对唐诗所作的大规模整理、流布有密切的关系。后来我的这一想法，再经修改、补充，写入《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的“纪念文集”（1995年编印），题为《文学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不过我当时还只着眼于古籍整理对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的影响，现在明善同志从宋人的文献整理扩展为整个宋代唐诗学，其视角高度就不一样了。

明善同志这部书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治学思路的清晰和结构体制的严密，显出这一代中青年学人对学科建设的理性探索和系统化、序列化的自觉追求。著者着力于纵横交叉的结构来展现宋代唐诗学的几个层面以及历史进程，又从禅学、理

学、史学与唐诗学的关系，提示其实际存在的深隐体系及其基本特征、研究方法；最后又从明清唐诗学的比较中突现其历史地位。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今后开展断代唐诗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样式。尤为可贵的是，书中在按这样的框架阐述中，并不泛论，还着重于具体究索，特别是对宋代几部有代表性的诗话，如《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等都能从其诗学体系出发详作比较分析。宋代唐诗研究演进，更从当时作家的创作要求着眼，把创作主张与理论宗旨结合起来，这对古代文学思想研究也是一种拓宽。

应当说，明善同志在写作中还是尽量参阅和吸收现代学者的成果，但仍有所选择，对有些不确切之处又能给予指正，这样的一种学风在当前也应提出并加重视的。

不过我想提一点不足之处，即可能是由于篇幅所限，最后部分，即宋代与明清两代的比较，似写得不够充分，这当有待明清两代研究的加强。又，这一章的两个标题，一是《开疆拓土的开创性品格》，二是《独自树立的背离性精神》，对第二节又概括为“诗学精神上的背离性”。我是同意第二节的具体论述的，认为宋人能冲破唐诗藩篱，学唐而变唐，在“变”与“复”的辩证统一中自立全新的诗风，又能面对“本朝诗”作出严肃反思，背离宋诗发展的主潮，主要是指扭转江西诗派的诗风，而回归唐音。我想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把这种情况概括为诗学精神的背离性，似有费解，这里的背离性应是指诗学精神本身，这样含义就有岐解。我想我们在作新的理论探讨时，不免会出现新词，但还是应求词通义顺。这一点也是与著者的切磋、交流，我想是符合前面所说的序文可以有“辨学术”这一体制。一笑。是为序。

2001年岁末，于北京六里桥寓舍

目 录

序·····	傅璇琮
前言·····	1
第一章 宋代唐诗学的层面分布·····	18
第一节、宋代文化的繁荣与人文精神的弘扬·····	19
第二节、宋人对唐诗别集的搜集与整理·····	32
第三节、宋人的唐诗选集及评点·····	49
第四节、诗话式评说的发展·····	91
第二章 宋代唐诗研究的演进历程·····	100
第一节、宋初三体：唐诗范式的探求·····	100
第二节、诗文革新：宋诗典范的确立·····	118
一、复兴儒学与振作士风·····	119
二、杜韩典范与诗文革新·····	125
三、苏黄诗风与宋调确立·····	152
第三节、千家注杜：宋代唐诗研究的深化·····	172
一、诗学理论的概括与升华·····	173

二、唐诗典籍的校注与编纂·····	192
第四节、唐音回归：宋代唐诗学的理论整合·····	222
一、唐音始归·····	223
二、唐音始盛·····	236
三、唐音大盛·····	239
第三章 宋代唐诗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特征·····	261
第一节、以禅论诗——禅学士大夫化对唐诗学的影响·····	262
一、北宋时期的诗禅并进·····	262
二、南宋时期的以禅喻诗·····	295
第二节、思辩——理学的兴盛对唐诗学的影响·····	302
一、理学之兴与宋调之萌·····	303
二、理学之盛与宋调之立·····	314
第三节、考证——史学的发达对唐诗学的影响·····	342
一、考证与唐集整理·····	346
二、考证与唐诗编年·····	350
三、考证与唐诗分期·····	353
第四章 宋代唐诗学的历史评价·····	388
第一节、开疆拓土的开创性品格·····	389
第二节、独自树立的背离性精神·····	395
后记·····	411
引用及参考书目·····	412

前 言

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时代质朴的四言诗，演变而为汉魏之五言诗，又经六朝的开拓而演变为五七言古诗，再经唐代三百年之发扬光大，不仅使五七言近体逐步走向成熟，而且其他各体也无不臻于完美，终至形成古典诗歌创作之巅峰。其间，时代风尚之变迁与演进同诗歌形态风格之发展与创变息息相关。正如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说：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

顾亭林将这种变迁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一个“势”字，也就是时代演进之大趋势。正是这种时代演进之大趋势，使诗歌的发展终至在才气发扬、真力弥满的大唐盛世推向巅峰。同时，也正是这种时代演进的大趋势，唐诗也不能不变而为宋诗。当宋人在唐人开辟的诗歌创作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了一段路程之后，毕竟感觉到了一种“失语”的悲哀。正如王安石所嗟叹的：“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①于是，他们不得不一步三回头地去回顾、审视唐人所走过的路，去思索、总结唐人每次成功地走出一部的经验与技巧。成就辉煌的唐诗，正如一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引。

座丰碑，矗立在宋人面前。学唐，是宋人必然的选择。然而，学什么？怎么学？又都一度成了宋人创作心理上沉重的困惑。

宋初诗坛上固然也活跃着一批具有一定成就的诗人，如李昉、徐铉、王禹偁等白体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西昆诗人，还有林逋、魏野、九僧等晚唐体诗人，而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就是王禹偁了。他在论诗主张上崇尚杜甫，在创作实践上模仿白居易，因此他自己就曾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①当时人也称赞他“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②。但是，他在诗歌艺术上缺乏鲜明的独特风格，模仿唐诗的痕迹太过显著，以至于他所作的《春居杂兴》诗二首，被其长子嘉祐疑为从《杜工部集》“窃之”。《蔡宽夫诗话》就此载之甚详：

元之本学白乐天，在商州尝赋《春居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山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复易。

然而，其它更多的诗作如《感流亡》、《对雪》等，则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艺术形式上都与白居易《观刈麦》一类诗十分类似，故世人皆以“白体”目之，未免受到“语多得于容易”，“意伤于太尽”的批评^③。

比王禹偁稍后的则是林逋、潘阆、魏野等一批在野的诗人，

①《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义颇有相类者，咨于予，且意于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小畜集》卷九。

②林逋《读王黄州诗集》，《林和靖先生诗》卷三。

③分别见于《六一诗话》，《岁寒堂诗话》。

以贾岛为自己仿效的典范，所作诗大都意绪绵密，笔调轻巧，潘闾曾在《叙吟》一诗中自叙创作态度道：

高吟见太平，不耻老无成。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

搜疑沧海竭，得恐鬼神惊。此外非关念，人间万事轻。

其中所道人生态度，创作主张等方面的理性追求，都与贾岛所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①达成了心理共振，大可作为宋初晚唐体诗人宗贾诗学主张的宣言书。但终因境界狭小，内容空泛，格调微弱，终未能摆脱晚唐五代气格摧弱，沦于鄙俚之弊，“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②，虽亦曾留意于变风，而“习尚难移”，终究“未能复雅”^③。

比白体、晚唐体稍后而在诗坛上煊赫一时的西昆体诗人，则都是一些朝廷文学侍臣，他们也曾以变革诗风为己任，他们的创作实践在当时也确实具有革新的意义，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指出的那样：“《西昆酬唱集》主旨华丽，盖一变晚唐诗体、香山诗体而效李义山。”“昆体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非高才博学未易到此。”正因为他们一个个都“高才博学”，所以，自然也就对白体的浅淡寡味，俚俗意尽，晚唐体的小巧呻吟，境界狭窄深感不满，于是选中了李商隐作为学唐诗的楷模，“资书以为诗”的倾向也就早于江西诗派而着其先鞭了。但正如欧阳修所指出：“《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④。问题的关键尚不在此，而在于他们自我标榜学李商隐却只学得了义山之皮毛。殊不知李商隐诗学杜甫而能近于杜诗

①贾岛《送无可上人》

②俞文豹《吹剑录》。

③苏颂《小畜外集序》。

④《六一诗话》中贬抑白体、晚唐体的言论较多，而对西昆体诸家的评论则多表现出景仰之情。此处似为仅有的一处较明显的批评性语句。

之浑成，而西昆派诗人只知学其用语艰深，却鄙夷杜甫，杨亿甚至说杜甫是“村夫子”^①，这就完全背离了义山精神，故而空落个“扞扯义山”^②，“独恨无人作郑笺”^③之讥。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④。这话若就宋初六十余年的诗坛而言，或许更能道出他们的苦衷。他们学唐诗，学得太像了，则失却了作为宋诗的主体地位，无以创立一代新的诗风，不足以与唐诗相抗衡而在唐诗的藩篱之外自立门户；学得不像了，又无法满足人们心目中固有的对“诗”的基本要求。宋人的困境既来自唐诗艺术高峰提出的挑战，也来自后人两重标准的苛求：反对摹仿唐诗，又不满于变异唐诗。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一《诗体代降》篇中所指出的，模仿唐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为我。”面对着这样一种二难困境的选择，宋人诗歌创作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三百年的唐诗作为一种已然的存在，已经是宋人的历史视野，他们无法回避，也不必回避。将它作为一种参照系，以之与此在的宋代社会文化的现实视野相融合，期于探索一条符合自身文化心理需求的创作新路，正是宋人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宋人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艺术手法上，提倡转益多师，别裁创获；二是在语言材料上提倡利用陈言，点铁成金；三是在意义结构上，提倡消化遗产，夺胎换骨。其总体精神在于推陈出新，在借鉴传统人文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在对前人作品的点化、变异、翻案的过程中，显示出思想的自由与智力的优越^⑤。在宋代诗坛上，以王禹偁为先导，经欧阳修、

①刘攽《贡父诗话》。

②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山谷》，《历代诗话续编》上。

③元好问《论诗绝句》。

④蒋士铨《辩诗》，见《忠雅堂诗集》卷13，清咸丰蒋氏四种本。

⑤参见周裕楷《宋代诗学通论》第167页，巴蜀书社1997年1月版。

梅尧臣等人的开拓,终于以苏黄诗风作为典型的宋调正式确立,完成了变唐立宋的艰难任务,建立了不同于唐诗的全新诗学规范,在诗歌发展史上创造了唐诗之后的又一次辉煌。

陈寅恪先生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之极致,宋代文化相对于唐代文化,它在理性思辩上更胜一筹,知识型、思辩型、人文型成为它最鲜明的特色。如果将唐代诗人比之为天真烂漫,语无避忌,富于幻想的少年的话,那么,宋代诗人则相当于是老成持重,知书达礼,深于思虑的壮年。唐人只顾一味地,无忧无虑地哼着自编自唱、纯朴向上的儿歌,质性天然,无多矫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韵悠扬;而宋人却要在深沉思虑之后,小心翼翼地将心底里最隐幽的话语藏去,或到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里去诉说,诗中出现的则大多为堂而皇之的,道貌岸然的,三缄其口而后发的“雅言”,是理性思考的结晶。然而,爱天真而厌老成则是人之常情,故而“唐诗如蜜,宋诗如橄榄”^②之喻,大概也就是本之于这样一种认识使然。但是,世间毕竟还有那么一些人是爱成熟美之深刻内涵的,而不是一味地贪恋风华爱少年,而且在人生不同阶段上,对风华之美的少年和成熟之美的壮年又有不同的偏爱。正是因为有这么两种不同审美观的存在,才会有唐诗、宋诗两种诗歌风格的对立互补。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指出:

①《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②“橄榄”之喻原出于欧阳修,他说:“梅翁事清初(一作‘句’),石齿漱寒漱。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精(一作‘清’)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噉。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六一诗话》第一二则)。又认为梅圣俞诗:“始读之则叹莫能及,后数日,乃渐有味,何止橄榄,久方觉永”(《王直方诗话》载,见《宋诗话辑佚》)。

相对于唐诗，宋诗更是一种在诗学理论、尤其是“句法”理论自觉指导下的实践。正是宋人的诗性智慧，促成了宋诗品格的诞生。最好的例证是，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吕本中、陆游、杨万里、刘克庄等人，既是两宋诗坛的领袖，又是天才的诗歌理论家。换言之，宋代诗学理论原则的确立者，同时也是宋诗艺术风格的创造者，学者兼诗人是宋代诗论家的一大特色。正因如此，宋代的文化精神在宋诗学中得到更鲜明、更自觉、更集中的体现。

可以说，理论的自觉是宋代诗坛区别于唐代诗坛的重要标志。他们不仅用理论的标尺去衡量唐代以及唐前的诗人诗作，品其优劣，评其得失，并且溯流探源，标体分派，而且也用这种理论标尺去规范自己的创作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宋代诗学理论原则的确立者，同时也是宋诗艺术风格的创造者”，“宋代文化精神在宋诗学中得到更鲜明、更自觉、更集中的体现”。不仅如此，他们首先还是唐诗精神的阐释者、弘扬者，唐诗经验的总结者、承传者。有的学者就认为：“诗歌创作和诗评、诗话的双线并行是中国诗史的独特景观；而历代诗话实质就是历代诗歌的原始接受史，它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坚实丰富的学术基础”^①。这种独特景观正是富于诗性智慧的宋人在前人不自觉地随意评说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出来的。郭绍虞先生在《清诗话前言》中指出：

后人每说唐人不言诗而诗盛，宋人言诗而诗衰。其实不然，

①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唐人不是不言诗,而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正是在唐人论诗著作基础上提高一步的。

他在《宋诗话辑佚序》中又说:

唐人说诗之著多诗格与诗法,或则摘句为图,这些都与宋人诗话不同,只有孟棣《本事诗》、范摅的《云溪友议》之属,用说部的笔调,述作者的本事,差与宋人诗话为近。

综合以上两段话,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一是唐人不是不言诗,只不过多以诗格、诗法及笔记小说为主要形态。二是唐人论诗之著又与宋人诗话有别,诗格一类主要是教授诗法技巧,即所谓“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①,而《本事诗》、《云溪友议》一类则又仅述作者之本事,一般不涉及理论,而诗话之作,则要“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②,而且要发表诗学见解,品评诗人诗作,进行文学鉴赏与批评。

从严格意义上说,第一部诗话应是北宋初年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所作《六一诗话》。书前“自题”有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见此书是在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致仕以后直至去世的两年中所集,然则,正是处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时,纂集诗话说是为了“资闲谈”或许不假,但以他所处的身份,这“闲谈”的份量亦自不轻。正如郭绍虞先生所指出的:“宋人论诗每偏于艺术而复宗尚自然,其义实自欧氏发之。欧氏于诗不没西昆体之长,而复主张李杜豪放之格,其能形成一代诗风,非无故矣。”^③作为首开诗话一体的著述,《六一诗话》虽仅二十八则,但实在可看作欧阳修一生对诗学理论与创作两个方面见解的总结,其影响之巨又非它书可比。首先,对宋初六十

①姜夔《白石道人诗说》。

②许顗《彦周诗话》。

③郭绍虞《宋诗话考》。

余年间流行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提出了批评，扭转了当时诗坛的不良风气。其次，大力提倡学习李杜韩三家诗风，尤其是竭力倡导韩愈诗风，为宋诗主体风格的定位指明了方向。第三，提出了不少影响久远的诗歌理论概念，如“意新语工”，“意在言外”等，这些不仅是对中国诗学理论宝库的充实与发展，同时更是为宋代诗学理论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第四，由欧阳修对唐诗的批评式接受而开启了唐诗名篇绵延千年的接受争端，其中最为著名的莫如对张继《枫桥夜泊》诗的评点，两宋对此展开的“夜半钟声”的争论以及后代对全诗的阐释、化用与再创，至今不绝，直到当代人陈小奇的一曲《涛声依旧》，将唐诗的当代性读解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欧阳修应属张继《枫桥夜泊》诗的“第一读者”。

受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影响，在有宋一代掀起了一股撰写诗话的热潮，据郭绍虞《宋诗话考》考定，宋代诗话著作“现尚流传者”有四十二种，“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之者”有四十六种，“有其名而无其书，或知其名而佚其文，又或有佚文而未及辑者”有五十一一种，再加之其中附及的数种，共约一百四十余种。近年又出版了由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①，对郭绍虞先生指明“有佚文而未及辑者”广加搜罗，作了大量的补辑工作，又将散见于别集、笔记等他书中的论诗之语亦加收入，由此，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宋人撰写诗话风气之盛，成果之丰，而这些诗话正是宋人诗学理论的主要载体。

宋人对唐诗的批评与研究，不仅限于诗话一途，其中编选唐诗就是一种重要途径。宋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如王安石、洪迈、赵师秀、刘克庄等人都曾编选、批注过唐诗选本。关于宋人选唐

^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全十册，共七百三十余万字。